

希罗多德“埃及卷”释读^①

杨 扬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市 200433)

摘 要:通过分析“埃及卷”在《历史》当中的作用,并进入具体的社会语境探讨其历史编撰。通过阐明“埃及卷”所记述的空间、时间、人与物,释读希罗多德对“埃及范式”的建构。论述这一范式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接受史,进而评价它对后世产生影响与其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

关键词:希罗多德;“埃及卷”;埃及范式;接受史;西方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84-06

“埃及一直‘萦绕’着欧洲,这远胜于埃及一直为欧洲所‘接受’”,埃及学家扬·阿斯曼曾经如此说道。^[1]然而时至今日,反观源于希腊语的“埃及”一词^②,我们所“接受”的埃及,又何尝不是被欧洲所“萦绕”。^[2]希伯来文明中那个残暴、粗野的埃及,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的第二卷“出埃及记”。古代希腊对埃及的了解则主要来自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二卷——“埃及卷”,在这位“历史之父”的记述中,埃及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那是一片古老而又文明的土地。为什么埃及在不同的文明记忆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象?西方观念中的埃及形象从何而来,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年来,希罗多德“埃及卷”因其独特而重要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③。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希罗多德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之中,分析“埃及卷”的编纂,“埃及范式”的建构及其对希腊人埃及观念形成的影响,并勾勒出其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

一、希罗多德的社会语境与“埃及卷”的编撰

埃及最早的希腊定居者可以追溯到普萨美提克一世(Psammetichus I)统治时期,据希罗多德记载,正是希腊人帮助他废黜了十一位国王,而大殖民时代的希腊也开始向埃及派遣移民,他们在三角洲建立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整卷为有关埃及的叙述,西方学术研究中多用“第二卷”(Book II)作为简称,笔者以为该卷内容独立,所记述的内容又都与埃及有关,因而可以称之为“埃及卷”。

^② 古代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家为“Hwt-ka-ptah”,“Aigypotos”则是希腊语的发音,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迈锡尼的“ai-ku-pi-ti-jo”,作为形容词使用。文中希腊语均转写成拉丁形式,用斜体标示。下同。

^③ 克里斯蒂安·弗拉德夫迪称希腊人观念中的埃及是一个“幻象”,希腊人对埃及的观念具体表现为三种形象,即诗化的、历史化的和哲学化的埃及。劳埃德在1975至1993年间出版了关于“埃及卷”的评注本(A. B. Lloyd, Herodotus, Book II.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Vol. 1-3, Leiden: Brill, 1975-1993),这个三卷本的评注本成为“埃及卷”研究的扛鼎之作。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则认为,希罗多德是通过将埃及塑造希腊人的反面,更好地认识希腊自身来获得希腊人自身的认同。菲罗泽·瓦萨尼亚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后殖民批评理论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全面地考察了古典时期不同希腊文献中的埃及形象,其中有关希罗多德的两章分别从空间和时间入手,揭示了隐藏在“自我”与“他者”之后的政治。黄洋进一步指出,像埃及这样的“他性”类型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贬损,更多地在于建立一个根本上不同的类型,而这背后是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参见 Christian Froidefond, Le mirage égyptien dans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d'Homère à Aristote, Aix-en-Provence: Faculte des Lettres, 1971; 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Janet Lloyd (t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hiroze Vasunia, The Gift of the Nile: Hellenizing Egypt from Aeschylus to Alexa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4-123页。

收稿日期:2010-12-30

作者简介:杨扬(1982-),天津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希腊罗马史。

定居点或贸易站,其中以提供科林斯陶器的诺克拉底斯(Naukratis)最为著名^①。^{[3]2.152-154}但是由于黑暗时代存留下来的史料和考古证据极少,所以我们无法断定当时希腊与埃及是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②。^{[4]230-233}随后“东方化时代”的希腊与埃及之间的联系日渐增多,考古和艺术史的材料提供了有力的证明^③。例如,这一时期的雕塑家忒勒克勒斯(Telecles)和忒奥多鲁斯(Theodorus),他们的作品显然是受到了来自埃及的影响。雕像的姿势多为双手并拢垂直置于身体两侧,相对于古风时期的人物立像比较僵硬,这种差异到了古典早期自然主义转变时期尤为突出。^[5]希腊散文记事家们对埃及的描述则是有关埃及的早期文献来源,他们当中较为著名的应属公元前6世纪中至5世纪初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此人有两部著作残存至今,一部名为《地理志》(Periodos tes ges 通常也被称为 Periegesis),这其中就包含了关于埃及的记载。除了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公元前4世纪阿布德拉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Abdera)也有关于埃及的记载,不过他现存的残篇很少,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同样来自阿布德拉的赫卡泰乌斯写作了一部流行的《埃及志》(Aegyptiaca),但也仅有残篇存世。不过,至于他们的残篇是否混淆,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确认。^{[6]25}

希罗多德时代的埃及处于第二十七王朝,恰逢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希波战争之后,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期间,埃及在伊纳罗斯(Inaros)的领导下爆发了遍及全境的反波斯暴动,并且获得了雅典的支援。^{[3]3.11-15;7.7}此时,希腊世界与埃及的联系日益紧密,希罗多德也具备了旅行的客观条件。他在提到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出兵埃及时说道,“许多希腊人也跟随着来到了埃及,有些是为了贸易,有些是充当雇佣兵,有些则是为了观光”。^{[3]3.139}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希罗多德在埃及的具体行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直至埃勒方提那(Elephantine)是我亲眼所见,从此往南则仅仅是道听途说”。^{[3]2.29}学者们对此也都纷纷提出各种假设,不过,希罗多德很可能到过埃及,这仍是大多数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假设。^{[7]6}同样,希罗多德游历埃及的时间也无法确定,唯一能够肯定的时间便是在公元前459年之后,因为他提到了希腊人参加的帕普雷米斯(Papremis)之战,据精通希罗多德文献的埃及学家劳埃德推测,希罗多德埃及之行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449至430年间。^{[7]6-9}但是不管怎样,正如劳埃德所言,“希罗多德是公元前664年至公元前525年间埃及历史的唯一连续记述者,尽管记载有误,它仍然是现代研究这一时期的基础”。^{[7]11-12}

纵观《历史》,希罗多德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记述了波斯帝国境内外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直到第五卷才进入希波战争这一主题。其中“埃及卷”为第二卷,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埃及地理、埃及风俗以及埃及历史^④。希罗多德如此编撰《历史》,显然有他自己的用意。按照希罗多德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多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3]2.35.1}后世学者对这个解释历来有着不同的意见,最为常见的一种解释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插入“埃及卷”是作为波斯帝国的背景介绍,通过记述如埃及这样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最终也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进而衬托希腊在波斯帝国的西进运动中却能够独善其身。^{[7]12-13}此外,希罗多德在叙述过程中经常使用“插话”作为波斯帝国的背景介绍,由于插话的出现十分频繁,以至于常常出现“插话中的插话”,“埃及卷”整卷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插话”。因此也有学者从叙事方法的角度加以论证,将之归因于口述传统的影响。^{[8]215}不过,“埃及卷”的作用绝不仅仅属于背景介绍抑或一段插话而已。斯蒂芬妮·韦斯特就曾批评劳埃德将“埃及卷”与全书其他内容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低估了希罗多德早期的

① 本文所引的古典文本参考了各前辈学者的译本,译文由笔者自译,下同。根据国际惯例,引文标注方式均采用卷数、节数或行数,后不再一一注明。

② 斯蒂芬妮·韦斯特就曾批评劳埃德“埃及卷”评注本在某些与希罗多德相关度较少的方面过于详细,如过分关注迈锡尼时代的联系,却忽视了黑暗时代的希腊本土与埃及之间联系的断裂。

③ 奥斯温·默里在1980年首次引入了“东方化时代”,所指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这一概念最先使用在艺术史范畴之内,后来则被逐渐引入其他领域。随着“东方化时代”被普遍接受,西方学术界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参见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④ 相对应的具体卷数和节数分别为,埃及地理(2.1-2.34)、埃及风俗(2.35-2.98)以及埃及历史(2.99-2.182)。

思想发展。^{[4]230-233} 劳埃德在最近的牛津版《历史》评注本中吸收了学界的意见,他指出希罗多德在对“业绩”关注的同时,序言中的那些道德和教诲的也遍及整个“埃及卷”。^{[7]Introduction} 对此,大卫·阿舍利的解读颇具启发性,“埃及卷”的统一性不在于编撰,而在于“渗透其中的民族、历史和哲学精神”,他进而指出,希罗多德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发现或发明了世界历史的空间”,而他给自己的任务便是“寻找希腊文化和经验在其中的定位”。^{[7]Introduction} 埃及成为这个世界历史空间中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可以说,由于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学者们的解释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那么,希罗多德试图构建起怎样的一个埃及形象?

二、“埃及范式”的建构

希罗多德是首个系统地记述埃及历史的人,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尼罗河的泛滥到法老的统治,从金字塔的修建到木乃伊的制作。可以说,“埃及卷”开创了一个独特的思想范式——“埃及范式”,将埃及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历史性文化空间观念。这具体表现在对埃及空间、时间以及人与物的建构。

(一)空间

“埃及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维度的埃及空间,具体可以将之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空间、政治(意识形态)空间以及文化空间。希罗多德首先确定了埃及的自然边界,计算出国土面积,列举了主要的山脉,甚至还包括了海岸线的长度。尽管在某些现象的解释上可能存在错误,但他显然已经把握住埃及地理的诸多要点。希罗多德尤其强调尼罗河的重要性,也正是他首次提出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3]2.5} 在此基础上,他仔细分析了三角洲形成的原因,并对尼罗河的源头做了一番考证。

然而,希罗多德对疆域的描述不是纯粹的地理学叙事,他对空间的划分还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区别。除了自然的国界,埃及又是法老的疆土,这具体体现于法老们的建筑工程,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法“业绩”。埃及的第一位国王米恩修筑了一道堤坝把孟菲斯和尼罗河隔开。^{[3]2.99} 而这个曾是法老治下的国度,现在已是波斯帝国的属国。瓦萨尼亚指出,希罗多德在叙述埃及的统治者通过调整景观形成空间之时,将这种“几何设计”与“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2]81,103-109} 可以说,地理与王权在记载中被统一之后,埃及的空间已然具备了意识形态。希罗多德如此强调地理环境与埃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与他所处的社会语境有着密切联系。^{[9]28-74} 例如,在同一时期的希腊作品当中,埃斯库罗斯按照神对统治权的划分,就将亚细亚属于波斯,欧罗巴属于希腊。^[10] 而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一篇名为《空气、水》的文章论述了政治制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11]148-169}

最终,希罗多德通过神谕对埃及的疆域及人口进行了定义,“全部埃及是尼罗河泛滥和灌溉的土地,而全部埃及人就是住在埃烈旁提涅的下方并且饮用尼罗河的河水的那个民族。”^{[3]2.18} 相较之下,荷马的世界里只有欧罗巴和亚细亚;而赫卡泰乌斯的世界渐渐分为三部分,出现了利比亚。^{[12]57-61} 希罗多德批评了当时伊奥尼亚人将世界分为三部分的说法,指出他们没有把埃及的三角洲计算在内是错误的。他认为埃及是独立于亚细亚和利比亚之间的一块地方,是亚细亚与欧罗巴的“过渡地带”。^{[3]2.17} 可见,埃及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地区,而从文化空间上来说,它与波斯帝国之内的其他国家相区别。

(二)时间

埃及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衡量其他地区的立足点,“至于埃及人本身,应当说,居住在农业地区的那些人在全人类当中是最用心保存过去的记忆的人,而在我所请教的人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人有这样多的历史知识”。除了普里吉亚人之外,埃及人是所有人类中最古老的,他们是有知识的人(logiōtatoi)。^{[3]2.2;2.77} 希罗多德显然乐于承认这一点,他指出希腊文化中的诸多因素都是借鉴了埃及文明,如宗教、神名、仪式以及法律。^{[3]2.177} 皮埃特罗·万尼切利则认为,希罗多德以埃及可证的记载定义人类历史的起始和程度,他细分历史空间为不同的时代是为了证明普世价值——人类的功业。^{[13]212-213}

同时,希罗多德也意识到将希腊的时间与埃及平行会造成的问题,那将会使希腊神话体系出现时代错位,进而导致希腊的历史体系崩溃,他最终选择将埃及那些古老的神祇与希腊同名的不朽英雄区分开来。对此,依安·莫耶尔指出,希罗多德是利用埃及僧侣提供的关于人类过去的认识来批评系谱的和神话的表述,进而发展出有关过去历史的认识。^{[14]70-90}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的埃及又是无时间性的。“埃及卷”中的时间可以分为两部分——历史与当下。虽然希罗多德承认埃及悠久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说埃及文明比希腊文明更优越。他记述的埃及是历史化的，而非当下的，这是一个去除了当代场景的埃及，一个被历史符号化的文化区域。这对矛盾恰恰是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正如阿舍利所阐释的那样，希罗多德如何将历史从基于线性的谱系模式中分离出来，对于他来说，世界历史既是线性的，同时也是循环的，伴随着帝国的兴起、鼎盛和衰落这一模式。^{[7]36-39}

(三)人与物

希罗多德可能是承袭了古风时代的诗人品达的那句格言“习俗是万物之王”，他对埃及人的习俗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埃及人的与众不同，“倒错”和“对称”则是他叙事的主要特点，“不仅是那里的气候和世界各地不同，河流的性质和任何其他河流的性质不同，而且居民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也和所有的其他人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他们上市场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则在家里纺织……在书写和计算时，其他人如希腊人从左向右写，埃及人则从右向左写”。^{[3]2. 35-36}对此，阿尔托格的解释颇有启发性，“埃及人似乎是人类日常行为的反面”，埃及和斯基泰是两个“镜面”，而希腊则是中间。^{[15]115}

逝去国王的“业绩”(to thomasion)处于纵向时间轴上的空间之中，它恰好能够连接空间、人和时间的纽带。瓦萨尼亚指出，“希罗多德会认为这些巨大的历史遗迹是依靠奴隶完成的，并由此进一步归因于埃及的专制主义，此时的埃及重新回到现实，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埃及无法成为民主希腊的学校”。^{[2]75-109}劳埃德的观点则更具“现代性”，他认为祭司口中的法老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埃及的一种政治宣传，而希罗多德显然轻信了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16]22-53}而黄洋则在阿尔托格的基础之上，强调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东西方世界二元对立的思想。^{[17]4-12}希罗多德对埃及习俗的一番“探询”显然是具有倾向性的，但是，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应该避免陷入“倒错”和“对称”的陷阱。对于希腊人来说，埃及与波斯真的都仅仅是异邦人，而并无二致吗？如果只谈根本性的“他性”，这样就很容易简单地将之归因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这样往往会忽视了作为“他者”的异邦人之间的差异，过度地阐释了希罗多德的本意。实际上，希罗多德对包括埃及人在内的异邦人持一种开放态度，他承认埃及曾经对希腊文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也就是被伯纳尔称之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的观念。^[18]

三、“埃及范式”的接受史及其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

希罗多德在世的时候，《历史》在希腊世界就已经十分流行。根据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记载，公元前445—444年间，雅典人曾经奖励希罗多德在公众面前朗诵他的作品。雅典的狄卢斯(Diyllus of Athens)甚至说，那个著名的苏格拉底的控诉者阿尼图斯(Anytus)曾经提议给予希罗多德10个塔兰特的奖励。希罗多德同时代或稍晚一些的古典作家，其作品中涉及埃及这一主题的主要有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欧里庇得斯的《海伦》以及伊索克拉底的《布希里斯》(Busiris)。虽然这些作品都只是将埃及作为一个背景，但能够隐约从中看到希罗多德“埃及范式”的影子。

令人遗憾的是，希罗多德的地理学、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却没有被他的后继者所延续。由于希罗多德的方法论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而且他又记载了太多的奇闻轶事，这也随之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埃及卷”的真实性问题。修昔底德就委婉地批评了希罗多德更加关注的是“取悦听众”，他放弃了希罗多德的探究方法，将目光转向了政治军事历史的研究。^{[19]1. 143}柏拉图更是将希腊人的“埃及范式”引向另一条道路。虽然柏拉图没有专门的篇章谈论埃及，但他的《斐德罗》、《蒂迈欧》、《克拉提诺》均以埃及作为背景。在《蒂迈欧》中，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与埃及祭司的对话，“你们希腊人总是小孩。在希腊是没有人能够成为老人的。”^{[20]21e}可以说，柏拉图在部分接受希罗多德的“埃及范式”基础之上，将埃及抽象化为一个哲学符号，成为哲学意义上对希腊“自身文化的反思”。^{[8]211-230}亚里士多德显然熟知希罗多德的作品，他在《修辞学》中就曾引用了《历史》开头“这里发表的是希罗多德的探究成果……”^{[22]1409a27}而亚里士多德

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希罗多德的探究,他在《天象学》中对埃及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还断言埃及人是最古老的民族。^{[21]351b27-352b20}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没有直接向东进攻波斯,而是首先征服了埃及,并在那里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瓦萨尼亚指出,正是“希罗多德、荷马和亚里士多德,定义了部分构成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的意识形态背景”。^{[2]32}虽然这一观点稍显牵强,不过,通过阿蒙神谕宣称他是“神之子”,是埃及的新法老,籍此合法取得了埃及的政权,似乎倒是借鉴了希罗多德对待埃及神谕的态度。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语逐渐成为传承埃及文化的语言。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将《历史》分为九卷,并分别以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来为之命名。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 of Sebennytus)则攻击希罗多德《历史》的真实性,他应托勒密一世的指示用希腊语撰写了30卷的《埃及史》。^{[23]1409a27}书中罗列了完全不同的埃及国王谱系,此外,他还专门撰写了一本攻击希罗多德的小册子。

罗马不仅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批评者,他们对待希罗多德的态度正如西塞罗那样矛盾,在赞扬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的同时,又将“谎言之父”的称呼赋予了他。^{[24]1.1.5}西西里的迪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在其《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第一卷记载了埃及的历史和文化,也被认为是根植于希腊的思想而非埃及。^{[25]2}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则是另一位继承者,在其《地理志》(Geographica)第十七卷中,也是有关埃及的记载。老普林尼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显然是回归了希罗多德的传统,其中的第六卷也记述了埃及历史,不过,战争和习俗不再是老普林尼关注的主题,“自然”成为叙事的中心。帝国时代的希腊史家普鲁塔克在《道德小品》(Moralia)中一篇名为《伊希斯与奥西里斯》的文论以埃及作为背景,他甚至还写了《论希罗多德的阴险》一文,指出希罗多德的偏私和不真实。

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被认为是埃及研究“复兴”的两个重要时期。^{[1]17-18}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文本”的复兴,这一阶段大量希腊罗马的文献被重新编辑或翻译。由于大量有关希罗多德《历史》“新的”文献涌现,学者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文献的考订和重新阐释。1474年,瓦拉(Laurentius Valla)将《历史》翻译成拉丁文。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于1502年在威尼斯出版了希腊文版本。随着希罗多德的作品被重新发现,他的“埃及范式”也被进一步传播。1566年左右,斯泰法努斯(Henricus Stephanus)在其《为希罗多德辩护》(Apologia pro Herodoto)中首先意识到新的地理发现对于评价希罗多德的影响。^{[26]65}

拿破仑远征时期则是“文物”的复兴。拿破仑追随着亚历山大的脚步,不过他的远征军带了近160位学者,他们负责各种系统的科学考察,尤其是对埃及的“业绩”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并建立了埃及研究院,随之产生了鸿篇巨制的《埃及志》(Description de l'Égypte),这套由众多学者完成的巨著正是对希罗多德博学的回应。

希罗多德的“埃及范式”面临真正的挑战是来自法国天才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成功地释读埃及圣书体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的现代埃及学。由于商博良的工作,埃及的古代文字变成了识读文字,学术界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埃及学日渐成为研究基础,希罗多德的记述不再是匮乏而单一的文献来源。另一方面,伴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中心论”的高涨和埃及再次被欧洲列强所征服,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发生了改变,希罗多德对待异域文明所持的开放态度,即“古代模式”不再被重视,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乃至欧洲文明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种观点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笼罩着西方世界。^{[1]12-13}

进入20世纪,埃及考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希罗多德的记载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而近年来,随着人类学、后殖民主义、历史叙事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西方学术界也从多种角度对希罗多德的叙述进行重新解构和阐释。“埃及范式”自然也被重新考察,纵观各种理论与解释,劳埃德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希罗多德提出了一个有关埃及历史的范式,但是这一范式对埃及历史的理解并不准确,所有的记述都是根据希腊人的喜好,而这正是一种希腊的范式。”^{[7]Introduction}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后世对希罗多德的埃及描述褒贬不一,但

是无论赞扬抑或批评,以何种方法和立场去引申发挥,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西方世界”观念中的埃及,或多或少地都能够在希罗多德所建构起的“埃及范式”找到一些影子。“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埃及范式”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就在于它早已“萦绕”于西方世界,并且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1] Jan Assmann, *Moses and Egyptians: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M].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Phiroze Vasunia, *The Gift of the Nile: Hellenizing Egypt from Aeschylus to Alexande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3] Herodotus, *The Histories*[M]. Robin Waterfield (t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Stephanie West, Review: Herodotus on Egypt[J].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ies*, 1978, 28(2): 230-233.
- [5] Gisela M. A. Richter, *Kouroi: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k Kouros from the Late Seventh to the Early Fifth Century B. C.*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6] Lionel Pearson, *Early Ionian Historian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 [7] David Asheri, Alan B. Lloyd, Aldo Corcella,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IV*[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8] François Hartog, “The Greek as Egyptologists”, in *Greek and Barbarians*[M]. Antonia Nevill (tr.), Thomas Harrison (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9] Rosalind Thomas, *Herodotus in Contex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Aeschylus, *Suppliants* [M]. Alan H. Sommerstein(tr.),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1] G. E. R. Lloyd (ed.), *Hippocratic Writing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
- [12] J. Gwyn Griffiths, Hecataeus and Herodotus on ‘A Gift of the River’[J].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January, 1966(1): 57-61.
- [13] Pietro Vannicelli, “Herodotus’ Egyp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Universal History”, in *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M]. Nino Luraghi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4] Ian S. Moyer, Herodotus and an Egyptian Mirage: The Genealogies of the Theban Priests[J].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2002(1): 70-90.
- [15] 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M]. Janet Lloyd (t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16] Alan B. Lloyd, Herodotus’ Account of Pharaonic History[J]. *Historia*, 1988(1): 22-53.
- [17] 黄洋, 希罗多德. 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J]. *世界历史*, 2008(4): 4-12.
- [18]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M].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 [19]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M]. Steven Lattimore(t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20] Plato, *Timaeus*[M]. Donald J. Zeyl(t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21] Aristotle, *Meteorologica*[M]. H. D. P. Lee(tr.),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22] Aristotle, *Rhetoric*[M]. George A. Kennedy(t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3] Manetho, *History of Egypt and Other Works*[M].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 [24] Cicero, *De legibus*[M]. Clinton W. Keyes(tr.),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5] Anne Burton, *Diodorus Siculus: A Commentary*[M]. Leiden: Brill, 1972.
- [26] 莫米利亚诺.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M]. 冯洁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张颖超